



## 加强对外文善本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费毓龙

十年动乱，给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造成了极大损失，外文古籍善本同样受到摧残。近年来，由于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关怀，中文古籍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外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起色却不大，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有不少人认为国内所存的外文古籍价值不大，没有必要化大力气去进行收集整理，而往往把它视作一般外文旧书，草率处理，保存不善，致使不少外文古籍遭受霉烂、蛀蚀等损失，至于对它的研究工作更是乏人去做。

事实上，明清以来数百年间，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文化事业单位都存有不少珍贵的外文古籍，甚至是摇篮版古籍<sup>①</sup>。

东西交通开创已有千余年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宗教等方面的中西交流大致可推至十六世纪。据杜尔(Joseph Dubr)《汤若望传》<sup>②</sup>载汤氏来华就携有三千余册图书。法国伯希和在所撰《艾田》一文中也提到利玛竇来华时曾带了举世闻名的《克利斯多夫·泼兰当(Christophe Plantin)所印的犹太文圣经，即泼兰当本多语种圣经合参(Polyglott Bible)八册。裴化行(Henri Bernard)也撰文提到利氏来华时曾携有数箱精美的图书<sup>③</sup>。1620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来华携带了七千部装帧、印刷精美的图书。这些图书数量多、学科门类多，版本也佳，虽然这批古籍不一定都运至我国，但已流入的部分，对我国研究西方版本学是值得重视的。这些书籍至今仍然受

到国内外人士的关注，更可见出其价值了。

近百年来，由于外国冒险家纷纷来华，其中也有部份学者，他们除了攫取我国的古籍外，确实也带来了不少的西方古籍，以致有一些外国政客及学者在中国就收集到不少极其珍贵的外文古籍。例如，李鸿章的幕僚美国人贝塞克(W. N. Pethick)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后任北洋军阀政府顾问的莫理循(G. E. Morrison)、伟烈亚力(J. Wylie)、穆麟德(Möllendorff)、裴化行(Henri Bernard)等人在华寓居期间，都收藏了大量的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外文善本。仅莫理循一人在我国北方一隅就收集到各种外文古籍24,000余册，地图版画一千余件，文种达20种，其中有些善本极其珍贵，令人叹为观止。例如1485年拉丁文初版的《马可波罗游记》，1496年意大利文初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游记》的各种文种的初版本共41种。这些与我国国情密切相关的古籍都因当时军阀政府的无知，让莫理循仅以三万五千英镑的廉价卖给日本三菱财阀岩琦，变成了日本的《东洋文库》。这是继《醉宋楼》外流到日本之后，我国在文化典籍上遭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对此，连当时的外文报纸《远东时报》也撰文抨击当时的军阀政府<sup>⑤</sup>。

尽管帝国主义掠夺了一部份外文古籍，但流散在我国民间或文化事业单位的外文古籍肯定远不止这些。这里仅以开封犹太寺院里所藏的希伯莱文的羊皮经卷十三部<sup>⑥</sup>为例，1851年被基督教传教士发现，当即购去六部，分别存于香港图书馆、伦敦布道会、大英博物馆、波特林博物馆(Bodlian Museum)、牛津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1866年美国入丁麓良又购去三部，其中之一存于耶鲁大学图书馆。此外，维也纳图书馆也搜集到一部，徐家汇藏书楼也购得一部，寄存欧洲。余下的三部至今下落不明。我国对此经卷并非一无所知，弘治碑、正德碑、康熙碑对此均有记载，可惜我国竟无一位藏书家加以关注，致使这些珍贵的文化典籍沦

落异国。

三十年代开始，王重民、贺昌群等著名学者曾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以杰出的科研成果打破了外国学者对外文古籍善本的收集研究垄断局面，开创了我国整理研究外国古籍的先风。

今天，我们整理研究外文古籍，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近年来，笔者先后发现了不少极为珍贵的文本和稿本。例如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的原著；殷鐸泽（Prosper Intorcetta）与郭纳爵（Ignacio Costa）于1662年首次以拉丁文合译的《大学》及《论语》前五章，题名为Sapientia Sinica（中华箴言）的后半部《论语》部份。此书目前只有大英博物馆藏有全书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各藏后半部的《论语》部分。这一罕见的孤本的价值是无须笔者在此赘言的。在收集方面，笔者也收集到1589年的《贝撒圣经》，十六世纪的西塞罗的著作如《家信集》等。

上海地区的上述发现，这是外文古籍发掘、整理、研究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说明了国内外文古籍的发掘整理工作大有文章可做。如裴化行的藏书也极著名，于三十年代他曾捐赠给震旦大学图书馆，现不知归那一所高校皮藏，如加以整理，这批古籍是会有一定的学术及文物价值的。

当然，发掘和整理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为我国的版本学领域开辟新领地，从而为保护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作出贡献。因此，我建议：凡保存外文古籍的学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宗教团体以及征集中外古籍的单位，亟需迅速加强外文古籍的整理工作。高校图书馆学系和有关单位应该在宣传保护外文古籍的同时，培养和建立一支短小精悍的专业队伍从事整理研究工作；特别是协调各地的外文古籍，使长期湮没的外文古籍得以发掘，已经发掘的得以整理和研究。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通过广大专业人员的努力，外文古籍的散佚、

损坏和无人从事整理研究的现状将会得到迅速纠正。

注

- ①外文善本按国际图联 (IFLA) 所订的下限是1860年, 即1801年 1月 1日以前的古籍得称为善本。西文摇篮版是指1450年至1500年, 这五十年间为西方活字印刷事业的摇篮时期, 所印的图书均称为摇篮版。据国外版本学家测算, 五百多年来, 因兵燹、火灾诸原因, 流传至今的摇篮版仅剩四万册左右。
- ②原书名为《Un Jésuite en Chine-Adam Schall》, 法文版, 引自第144页。
- ③裴化行《明代之西欧学术讲习会》, 鲁意译, 北辰第六卷第十九号第27页。
- ④原名为《Far Eastern Review》, 1917年9月。
- ⑤引自1851年8月16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 蒲松龄的佚著《药崇书》将由 《文献》杂志发表

蒲松龄纪念馆工作人员, 于一九八四年二月, 在距蒲氏故里蒲家庄三华里外的徐家庄, 发现了蒲松龄的佚著《药崇书》传抄本。该书的收藏者孙迎瑞同志, 素爱文物, 家藏有不少古籍版本与抄本。国家文物法公布以后, 他受到很大鼓舞, 特将该书捐献给蒲松龄纪念馆。传抄本《药崇书》上下两卷, 系用毛边纸抄写, 楷书, 字体工整, 未注明抄写年代及姓氏。书长三十厘米, 宽十六点五厘米, 表、里完好无损。除自序、目录外, 全书分急救、内科、外科、妇科、幼科五部分, 共录有处方二百六十一个, 其中多为方便验方。它充分表现出蒲氏千方百计为缺医少药的百姓解难分忧的思想品德。该书写于清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年), 国内不传, 此为初次发现。该书将于一九八五年第一期起, 由《文献》杂志全文发表。

· 翟慕昕 杨海儒 ·